

权力与社会

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

POWER AND SOCIETY: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HAROLD D. LASSWELL ABRAHAM KAPLAN

[美] 哈罗德·D. 拉斯韦尔 亚伯拉罕·卡普兰 著

王菲易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权力与社会

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

POWER AND SOCIETY: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HAROLD D. LASSWELL ABRAHAM KAPLAN

[美] 哈罗德·D. 拉斯韦尔 亚伯拉罕·卡普兰 著
王菲易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美)拉斯韦
尔(Lasswell, H. D.), (美)卡普兰(Kaplan, A.)著;
王菲易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 Power and Society: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ISBN 978-7-208-10167-8

I. ①权… II. ①拉… ②卡… ③王… III. ①政治学-
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4228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王小阳

权力与社会

——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

[美] 哈罗德·D. 拉斯韦尔 著
亚伯拉罕·卡普兰

王菲易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 插页 4 字数 250,000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167-8/D·1939

定价 40.00 元

政府之所以为政府,不是因为政府这个名称本身,而是因为与之密不可分的权力的行使与运用。

——约翰·洛克

序 言

对于任何关注跨学科协作的人而言,关于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之间合作的简要记述,大都有所助益。本书是“战时沟通研究项目”(the Research Project on Wartime Communication)的副产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前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基础上于国会图书馆的架构下组织进行的。国会图书馆的项目包括以下几项:完善对大众沟通媒介的研究;录用和培训那些服务于宣传、信息和情报机构的人员;对于战略、策略和组织问题提出建议;描述和分析战争危机历史的某些阶段。

作为研究和分析的指南,有必要对政治沟通知识,尤其是当下的战争沟通知识进行回顾。毫无疑问,必须通过对关于权力制度和沟通过程的学科理论、程序和研究发现的全面介绍才能对这些知识进行概括与总结。由于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常常是零碎的、分散的,进行这样的概述总是困难重重。这种状况在创造和运用新的检测和处理数据的方法方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时代,而它的盛行是以经验研究异常迅速地蔓延为代价的。在“经验革命”中所运用的方法涵盖了从内涵到外延的广泛的程序范围,例如,精神分析访谈的延长;传记的诱惑;共同体生活的参与式观察;特质、态度和贡献的测试;简要的投票访谈。

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回顾是为了对经得起未来调查的命题进行对照和强调。需要在定义中对在该领域中经常使用的含糊不清的术语进行客观检验。对持续进行的政治研究进行定位,需要足够的逻辑分析,以保证所阐释命题的实证意义。因此语言哲学和科学方法论专家学者之间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双方的研究兴趣聚焦于符号的作用,双方之间的合作非常顺利,多年来政治科学家承担了宣传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而从事符号和语言研究的哲学家也与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鲁道

夫·卡尔纳普(Rudolph Carnap)和芝加哥大学的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进行了合作。

本书的初稿完成于1945年底,当时卡普兰先生加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哲学系,拉斯韦尔先生成为耶鲁法学院的教授。在过去的五年里,无论是该领域的研究还是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建构一个与研究状态同步演进的研究框架,却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与我们再次根据关于这些或那些观点的持续变化而进行重新论述相比,所要考虑的实际要素使得以现在的形式提供材料更为可取。

这部著作的文稿已经在讨论班进行讨论,尤其是在耶鲁大学,在这里更为详细地研究某些法律问题是学生的预备课程。除了对我们的有益批评之外,对其中某些将来可以利用的建设性观点的提出者表示感谢,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写作的初期阶段,我们尤其感谢内森·利斯(Nathan Leites)所提供的珍贵帮助,现就职于兰德公司;以及约瑟夫·古德森(Joseph M. Goldsen),时任国会图书馆项目的研究指导,现就职于兰德公司。在耶鲁大学,我们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威廉·福克斯(William T. R. Fox)教授(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奥利路大学的迈尔斯·麦克杜戈尔(Myres S. McDougal)。奥斯陆大学的哈拉尔德·乌弗斯达博士(Dr. Harald Ofstad)在其在此逗留期间做了十分全面的评论。正如参考文献所示,几位近期和当代学者发表的著作对我们的启发更大。在美国,有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罗伯特·麦基弗(Robert M. MacIver)、W. W. 威洛比(W. W. Willoughby)、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在英国,有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J. Laski)、乔治·卡特林(George E. G. Catlin)、理查德·托尼(Richard H. Tawney)和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在西欧,有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和J. K. 布伦奇利(J. K. Bluntschli)。

最后,我们对耶鲁法学院的支持以及系主任韦斯利·斯特吉斯(Wesley A. Sturges)所提供的方便表示感谢,同时还要感谢国会图书馆馆长阿奇波德·麦克利许(Archibald MacLeish)和卢瑟·伊万斯(Luther H. Evans)为我们的研究所提供的帮助。

哈罗德·D. 拉斯韦尔
亚伯拉罕·卡普兰

目 录

序言 / I

导论 / 1

政治科学、哲学与政策 / 1

权力过程 / 5

政治研究 / 8

第一篇

第一章 个体 / 19

反应、环境与倾向 / 19

外化与整合 / 21

符号、认同与人格 / 23

第二章 观点 / 30

价值与需求 / 30

情感与预期 / 33

利益与关注结构 / 35

第三章 群体 / 42

组织 / 42

公众、公众舆论与普遍利益 /49

社会与制度 /55

第二篇

第四章 影响力 /65

价值与价值地位 /65

影响力 /68

社会结构 /71

社会过程 /76

第五章 权力 /82

决策与权力 /82

影响力和权力的形式 /89

选择与强制 /99

第六章 符号 /106

政治符号 /106

宣传 /111

政治神话 /116

政治程式 /123

权威 /128

第七章 实践 /138

所要考虑的要素与条件 /138

领袖与老板 /145

代表 /152

政党与派系 /158

第三篇

- 第八章 职能 /167**
 主权、国家与政府 /167
 最高权威、政治统一体与统治 /172
 政治职能 /177
- 第九章 结构 /186**
 精英、等级与统治阶级 /186
 统治形式 /191
 政体 /196
 民主 /204
- 第十章 过程 /220**
 政治行为、运动与循环 /220
 形成中的势力均衡：战争危机 /228
 形成中的势力均衡：革命危机 /236
 革命的过程 /241
- 常用参考文献 /256**

导 论

政治科学、哲学与政策

本书不是分析当代或未来政治局势的著作，而是一本政治理论著作。下面的章节不包含统计学的或轶事类的复杂数据，这些数据旨在描述当今重大的政治趋势并促使人们采取各种政策或实际行动来推进或阻止这些趋势的发展。

但是，对当代或未来政治局势的清醒认识，指引了下文将要提出的观点。在战争、饥荒和核毁灭的时代，安全和物质福利是世界关注的焦点所在，这和控制暴力一样也是世界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将福利视为社会的主要价值之一，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将其引入政治分析之中，并对暴力在人际关系中的角色予以特别关注。为明确表述我们的观点并不是局限于我们自身社会的条件，而是为实现文化的普遍性，我们阐述了“一个世界或者一无所有”(one world or none)这种非此即彼的全球性观点。此外，当代政治力量近似呈现为一个两极体系，围绕着世界革命的最后两个中心——自由民主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因此，我们将革命视作政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阐释意识形态在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关注权力在预防性政治中的整合功能(而非分裂功能)。作为社会事实和社会符号的阶级，其在当代的重要性表现为我们强调功绩而非等级、技能而非地位才是民主统治的要旨所在。

上述内容还可以继续扩展，但是详细说明理论结构和情境模型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不是本书的主旨所在。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政治行

动提供指导；这样的指导和指南式著作历史悠久、令人瞩目，从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考底利耶(Kautilya)的《利论》到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君主论》，再到列宁的著作。¹然而，我们的目标，不是重新撰写这类指南式著作，而是详细描述一个概念框架，使得对政治过程的研究可以在该框架下有效展开。因为，事实上只有在这类研究的基础上，才可以灵活地选择和运用政治政策。

如果说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推进政治理论的发展，而非政治实践技术的进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会关注具体情境中的实践。理论化，即便是关于政治的，都不应与从经验观察和控制中抽象出来的无可救药的形而上思考相混淆。这种思考是德国国家学*(Staatslehre)传统的典型特征，在世纪之交其影响显著。²本书更接近于马基雅维利的《李维史论》或者米歇尔斯(Michels)的《政党》所强调的直接的经验主义立场。不过，另一方面，这不会与冷漠的经验主义立场——仅仅是“事实”的叠加，而没有关于假设的相应阐释——相混淆，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和布赖斯(Bryce)的描述性政治有时险些落入这一陷阱。布赖斯呼吁：“我们需要的是事实，是事实、事实、事实。”(1924, I, 12)³当然，对他们而言，“事实”就是细节的集合；事实仅仅是作为假设的数据时才是重要的。

所谓对假设的阐释，就是在逻辑上预先设定一个概念框架，从而可以根据该框架对假设进行确切的表达。在政治思想史上，许多著作都是以提供与政治学相适宜的词汇为目标。其中，最著名的英文著作是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Sir George Cornwall Lewis)于1832年出版的《政治概念的用途与滥用》。刘易斯希望使政治理论在语言的使用上与实践政治学更为一致。当然，这种预期的结局注定是令人失望的：无论是法令，还是规劝，都不可能使其用法一致，也无法使任何有超越意义的重要性都千篇一律。关键是足以使翻译和经验指导总是可能的自洽性和透明度。此外，我们关注的是概念，并非字词。涉及的问题不是物理学家关于“共时性”涵义的问题，或者生物学家关于物种的分析，而仅仅是概念学的问题。⁴

* 巴斯蒂将 Staatslehre 译作“政治学”，其实更准确地应译为“国家学”。不过，国家学和广义的政治学同义，本书将其译为国家学。——译者注

许多最有影响的政治著作——比如柏拉图(Plato)、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等人的著作,以及《联邦党人文集》等——都是为现存政治结构或理想的政治结构提供合法性论证,根本不关注政治研究本身。我们认为这些著作确切地表达了政治学说,而非政治科学的命题。政治哲学不仅包括学说,而且包括对学说和科学的逻辑分析;对所有这些类型的判断而言,政治理论这一术语是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而被使用的。

本书意图明确地表达政治科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假设。它不包含对政治学说的详尽阐述,即国家和社会应当如何的学说。从历史上看,正如拉斯基(Laski)所指出的,这些政治学说主要是用于证明政治哲学家自身的偏好及其所属群体的正当性(Laski, 1935, 31)。比如,黑格尔(Hegel)将普鲁士国家视作普遍理性(universal reason)的最高化身。正如其他学者所提及的,“政治思想的任务或许并不仅仅在于清除那些阻止人们将国家视为其缔造物的偏见,而且更要提供国家应该如何的学说”(MacIver, 1926, 426)。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兴趣不必排除对政治科学研究的结果和应用方面的政治兴趣。研究不仅在政策形成过程中扮演创造性角色——在一系列重要性不断变动的事件中作为自我定位的手段——而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扮演工具性角色。因此,研究的主要意义既不必然是理论性的,也不必然是实践性的:既有操作性观点,也有沉思性观点。

从操作性观点来看,以问题情境为起点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决定情境中可供选择的目标,并根据通往目标的行动过程明确阐述该问题。情境中的各要素是根据它们在政策形成中的影响而被分析和评价的。研究的结果是对这样一种行为方式的权威说明,即情境中的行动者以这一方式能够提升事件的特定状态出现的可能性:为创造结果 Y(或是使 Y 出现的可能性变大),那么就以方式 X 行动!

沉思性观点并不关注分离目标变量也不关注发现被认为具有特定重要性的行动,而是根据各变量对持续展开的研究的重要性,来阐述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此,命题表明了函数性共存关系的存在(形式 Y 是 X 的一种函数)。显然,这些明确的表述可以转换为操作性观点,反之:如果 Y 是且仅仅是 X 的一种函数,那么必须以方式 X 行动才能创造结果 Y。

还必须说明的是,根据不同观点进行研究,其所得出的结论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并不意味着观点上的差异是无要紧要的。完全依赖操作性观点——因而将研究局限于对方式和手段的思考——会有研究受阻的风险,如果它有与既定政策(目标)相反的含义。另一方面,纯粹的沉思性观点无法成功地在既定情境下使研究最大限度地与社会中最可能的和最紧迫的需求联系起来。这就是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献所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⁵

从操作性观点来看,社会科学更多地被指称为政策科学——其功能在于提供与内化于人际关系中或者由人际关系所实现的价值整合相关的智识。我们把政治科学视作政策科学之一,即从整合性观点来研究影响力和权力。社会政策的问题是创造条件的问题,在这些条件下权力能够而且的确会有序运行,从整体上而言这些条件是与社会的主要价值相关的。

关于政治科学的这一定义,在许多方面与政治思想的重要传统是一致的。如果所谓的“权力政治”意味着追逐权力是社会的最高价值,那么历史上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中没有哪一位是根据“权力政治”来界定政治科学的。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学者都注意到权力的强制性面相,而且注意到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使用强制力或是屈从于强制力。然而,所有这些学者都认识到,权力可以作为使其他价值最大化或是实现“善的生活”的工具。

因此,本书的概念是符合政治和道德紧密结合的哲学传统的。但是在充分意识到政治理论中并存着两种不同成分——政治科学的经验建议和政治学说的价值判断——方面,它背离了这个传统。本书的工作仅仅是对前者进行明确阐述。

对在研究中综合运用操作性观点和沉思性观点的方法,我们可称之为结构分析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nfigurative analysis)⁶。无论是对理论还是实践而言,审慎地使用这两种观点都是有价值的。科学家的职责与政策制定者的职责部分是重合的,两者相互影响。作为一个公民、一个有道德的人,科学家有自己的偏好、目标和价值;他的所有行为,包括其科学研究行为,都服从于自我约束的道德目标,而这些目标又激励和丰富了他的科学研究。

因此,本书的目的在于为政治科学的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不关注政治政策。我们的价值观是追求实现自由社会的公民价值观。因此,我们十分注重论述有利于建立和维系自由社会的条件。这些论述在某种程度上是富有成效的,它们通过深刻剖析自由所赖以实现的制度来培育自由。我们并不关注对民主价值观的辩护,它们与某些形而上的或道德的基础相异。这是政治学说的研究领域,而非政治科学的研究领域。对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认识是混乱的,人们没有对两者的区别进行结构分析;只有研究才能将两者联系起来。

权力过程

近年来,对政治科学的全面的、经验主义的、哲学式的研究在许多方法中都有阐述,如逻辑实证主义、操作主义、工具主义,还有些方法坚持认为将科学观点与材料(最终可由直接观察所获得)相联系是非常重要的。⁷依据这种观点,本书主要是根据影响力和控制之间具体的人际关系来分析诸如“国家”和“主权”之类的抽象政治概念。政治科学的实验数据是那些被视为影响或决定其他行为的行为,这是一种蕴涵在权力这个核心概念中的关系。作为一门经验学科,政治科学研究权力的形成与分享。

政治科学的主题可以根据某类事件(包括“主观的”事件)而非永恒的制度或政治模型来加以表述,借此可以表达抽象政治概念的经验基础。我们把权力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这个过程是由实验性的、地方化的、看得见的行为所构成。结构和功能都可以被解释为抽象概念,而它们向来被界定为过程。政治研究的这一定位可以被称为暂时性原则(principle of temporality)。

暂时性原则并不意味着只关注情境变化,而不关注事件的状态。政治研究以这两类问题为研究内容,所以也可以相应地被称为平衡分析或发展分析(equilibrium or developmental analysis)。

在某些情形中,一系列变量之间“系统性地”发生互动关系——它们组成一个系统,在该系统中它们趋向维系某种特定模型的互动。在这个

意义上,生物体就是这样一种系统。平衡分析的观点将学者的研究引向孤立这些系统以及观察这些系统得以维系的条件:混乱可能导致平衡的重构或是系统的崩溃。平衡分析的观点不仅使得生理学(与物理学所谓的“封闭系统”无关)的研究硕果累累,而且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亦是如此,比如在经济学的分析中。对于权力、尊重或其他价值过程的研究,这种研究观点同样适用。或许正是权力关系的结构使得对模型的干扰开启了恢复原始结构的趋势(“权力均衡”的过程)。⁸

发展的观点关注的不是系统的平衡,而是事件演替的模式。对这些模式的研究,直接指向对最后阶段的界定——从哪里到哪里的发展次序。⁹因此,对核心概念的归纳可能不如对平衡分析概念的归纳那么全面。比如,我们会说世界格局从“19世纪的私人资本主义”向“20世纪的社会主义”转型——这些概念中缺乏诸如“经济体系”和“经济危机”之类的普遍概念。但是,相对而言,发展的观点不具有普遍性,这一点使得其对行动的意义更为直接。决策是向前看的,它会阐述扩展至未来的选择性行动过程,并且通过预测事件将会如何来作出选择。“事物将要呈现的方式”是发展的观点所要关注的典型问题。¹⁰

暂时性原则的涵义之一是对在不同类型的事件中出现的实际的或可能的顺序进行强调。政治科学并不涉及事物的本质,即将事物永恒地区别开来并归入特定物种。政治范畴之间存在许多连续性,如同在实践中由范畴构成的不断变化的事件的特征一样多。因此,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差别在此是根据分歧而非二分法来明确表述的;政治特征不是被简单地描述为“A”与“非A”相区别,而是A和Z分别代表了所讨论对象的特征的两个端点。例如,我们不是将民主制标榜为完全不同的政治形式,而是详细说明了从民主到专制的各种特征。从技术上而言,绝对的断言已被发挥功能的事物所替代,也就是说,那些表示功能的术语具有许多“价值”,从而允许程度上的变化。¹¹

我们不是预先假定这些程度可以进行量化比较;公制的引入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随着一系列要素的安排而来的。从逻辑观点而言,它就是对构成古希腊和现代科学的区别(即物种科学同和功能相关的科学之间的差别)的基础进行彻底分类的一种安排。只要是根据顺序和程度的变化来表述概念,测量的范围和方法就可以向满足特定问题的需求的方向

发展。¹²

暂时性原则对政治科学的研究范围也有重要影响。由于作为过程的权力构成了政治科学的研究主题,因此其研究范围就无法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截然分开。不像经典的物种科学,对事件来说,相互之间是融合互动的关系。权力过程不是社会过程中一个截然不同的、分离的部分,它只是互动整体的政治维度。从整体上说,它事实上只是社会过程的政治维度。¹³因此,从其他观点来看,下面要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是适合于心理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而不是政治科学所特有的。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在所涉情境和行为中有重大影响的所有变量,而不仅仅是在早先科学分类中可以归入某些特定范畴的变量。

尤其是,必须强调任何既定政治事件中所涉因素的多样性——这种强调可被称为相互决定原则(principle of interdetermination)。这一观点有时又称为“多重因果关系”原则。但是涉及的问题不只是多重原因,还有多重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互动模型,在该模型中,我们无法区分孰因孰果。因此,我们所要谈的是一系列变量之间的相互决定关系,每一个变量都与其他变量相关。所以,在此,我们不是将政治分析局限于考虑某种特定类型的变量;政治科学是自在自为的,它不是应用心理学或应用经济学。但是其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它独立于所有其他社会科学,而是意味着不可以把政治科学限制在社会科学的某个领域之内。¹⁴

在政治过程的多个决定要素中,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各种文化和人格因素,而这些因素常常为政治学的专业概念(比如经济)所忽略。由于这些因素通常是通过符号来表达和加以运用的,所以可以用符号来分析这些因素。在近期的研究中,符号逻辑学、语义学和一般的符号理论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些学科强调并明晰了符号在各种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也注意到在关注符号的本质和功能时的重大混淆。符号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在后面的章节中将有详细阐述,尤其是在阐述预期、需求和认同时。政治科学对符号的强调,我们可称之为符号化原则(principle of symbolization)。

这一原则不仅包括认可符号(及符号所表述的客观事实)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对符号和符号化的语言参考之间的差别有着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必须将正式权力与它所声称的与之一致的有效控制区别开

来。我们建议,根据某些符号的运作来分析权威的属性;事实上,符号可能遮蔽了某种控制结构,这种控制完全不同于由符号所构成的权威模型。¹⁵

政治研究

不仅要关注政治过程中所使用的符号,而且要关注在对政治过程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符号。和在其他领域一样,在政治理论中,语义的混淆明显影响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的展开。毫无疑问,这些混淆部分导致了过去的政治洞察力的普遍轻蔑和对这一领域将会取得什么成果的普遍失望。但是模糊不清、茫然不定、含糊不明并非政治科学的主题所与生俱来的特点;只有当我们不去试图避免这些问题时,它们才是不可避免的。¹⁶

因此,在下面的篇章中,我们通过明确阐述定义来介绍政治科学的主要术语。在许多例子中,概念和术语的差别体现在复杂的分类学结构中。这样一种分类法只是政治研究的工具,而非替代物。除非下定义是作为系统观察和解读政治过程的工具,否则定义就无法丰富语言的表达。写在卷首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名言是再适宜不过了:名称本身,无法构成政府,也无法构成政府科学。名称仅仅限于在这种或那种情形下提供研究的工具和框架。如果名称及其定义要超越言语的重要性,那就必须在框架中使用这个工具。

在某些例子中,定义纯粹是“名义上”的:定义所介绍的语词不是先前使用过的(至少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而仅仅是为了方便使用符号。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定义可以纳入传统逻辑上称之为“本质定义”的范畴。定义是为了使由常规用法所体现的内容清晰化和明确化,从而分析所要表示的概念。

但是用法仅仅是明确地表达概念时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其自身并非决定性的。这不仅是因为用法可能不一致,更重要的是因为在这里定义明确表述对政治研究而言是工具性的而非语言学上的意义。成功执行这种功能常常需要限制或扩展定义的常规用法。然而,在用法已经明